

A STUDY ON THE TRANSLATION OF

IMPLICIT MEANING IN

LITERARY WORKS

文學

中的科学翻译与艺术翻译

——文学作品中之言外之意的翻译研究

卢玉卿 著

天津市2010年度社科规划项目

文学中的科学翻译与 艺术翻译

——文学作品中言外之意的翻译研究

A Study on the Translation of Implicit Meaning
in Literary Works

南开大学出版社
天津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文学中的科学翻译与艺术翻译：文学作品中言外之意的翻译研究 / 卢玉卿著. —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10.12

ISBN 978-7-310-03465-9

I. ①文… II. ①卢… III. ①文学—翻译—研究
IV. ①I04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230097 号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南开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出版人：肖占鹏

地址：天津市南开区卫津路 94 号 邮政编码：300071

营销部电话：(022)23508339 23500755

营销部传真：(022)23508542 邮购部电话：(022)23502200

*

河北昌黎太阳红彩色印刷有限责任公司印刷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

2010 年 12 月第 1 版 2010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880×1230 毫米 32 开本 7.125 印张 2 插页 180 千字

定价：18.00 元

如遇图书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营销部联系调换，电话：(022)23507125

序言

翻译是科学还是艺术，这是翻译界长期争论的问题之一。而且多数情况下是各抒己见，无法达成共识，于是就形成了科学派和艺术派争鸣的局面。

其实，文学翻译有艺术的一面，也有科学的一面。首先说，翻译是艺术。如果翻译的原作一件艺术品，而译作不够艺术品的水平，那就应该说翻译不算成功。原语和译入语不但语言不同，所涉两种文化也经常是差异很大。这样要在翻译中保留作品的艺术特征，就必然要有一个艺术再创造的过程。因此，译者需要有艺术家的才能、气质和审美心理。艺术性是文学作品译作的生命。

然而，翻译既然是一个再创造的过程，它就应有别于原创的过程，译者在翻译的过程中就应受到原作的制约。就是说，虽然译者有着不同的艺术眼光，而且依照阐释学的理论，译者在翻译时总是把自己的“前见”带入译作之中，但译者再创作时所依据的应该首先是原作者的经验和观念，要考虑原作的文化和艺术特征。自然，译作不是像照相那样的机械复制原作，而是要有一个再创作过程，会加入新意，会将原作提高，自然也会与原作发生偏离。但偏离不能过度，超过一定限度的译作就会降低原作的艺术水准，误导译文读者。优秀的翻译家在翻译时，能够凭借自己的经验和对翻译的理解，把握适当的度，使译作获得成功。

有些译者有很高的艺术天赋，产生了不少优秀译作，但他们在翻译过程中有时发挥过度，忘掉了原作的制约，像天马行空，独往独来。如夏济安翻译的霍桑的《古屋杂忆》，文字优美，没有

“翻译的痕迹”，也曾有人誉之为“原作美感经验的再创作”（林以亮：“翻译的理论与实践”），但一经推敲，发现不少地方是望文生义，误译甚多，译文流畅，意义却去原文甚远，因此受到译界严肃的批评和诟病。再如霍克斯译《红楼梦》。为介绍中国文化，霍克斯做出了艰巨的努力，克服了种种障碍，取得了很好的成就，其译作被不少人赞为佳译。但他的译作中也有一些过度的地方。如将汉语的“红”刻意地译为 green(绿)，选《石头记》作为英文译名而不用中国通用的《红楼梦》。我们可以理解其照顾读者的苦心。但“红”这种颜色是涉及到中国文化较为本质的东西，这种改变不可不谓重大。虽说这样做是受到各种因素包括是东西方不平等文化关系的影响，因而也不能过多责备霍克斯本人，但这毕竟事涉原则。我们不妨问一下，中国的“红学”在译成英文时可以变为“绿学”吗？还有一个宗教问题，中国的道士在英文译文中，也像基督徒那样唱着歌子追求“救赎”。这不但抹杀了中国文化的特征，而且破坏了艺术品内部的同一与和谐。

这样，我们就看到，文学作品的翻译，除了有其艺术性的一面之外，还有其他一些东西是需要注意的，有些规律还是要遵循的。阐释不能无边无际，不受制约。理论上讲，任何事情都有规律可寻，翻译自然不能例外。这种规律就是翻译的科学性的一面。科学性不仅仅体现在翻译技巧的运用，对原文思想的处理，而且体现在翻译过程中各种关系的处理，如翻译所涉两种语言和两种文化之间的关系，译者和作者及读者之间的关系等等。认识并自觉运用这些规律是译学建立和发展的必要前提和条件。

当然，注意到翻译科学性的一面并不是要译者死死地拘泥原文的形式，或紧扣某些不变的教条，从而使自己不能发挥聪明才智，主动地进行艺术创造。宏大叙事结构下要有开放的动态的发展。理论是灰色的，生命之树却永远是长青的。译者的经验和才能，译者的创造性发挥，是成功译作的可靠保证。本着这种精神，

言外之意的翻译是翻译研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课题。这本论文专著对其进行了初步的探讨。但这方面尚有大量的工作要做，特别是对于成功译作中言外之意翻译的丰富经验，更有待于进一步的发掘研究和整理总结。路漫漫其修远，我们将坚持不懈地努力。

崔永禄

2010年于南开园

前言

言外之意是中外文学创作的追求和审美标准，是文学作品的机体营养，是语言交际的巧妙策略。言外之意体现艺术语言的情景交融、含蓄隽永、无言载意；更体现语言交流的风趣幽默、委婉含蓄、弦外之音。中外哲学、文学、语言学三个领域对言外之意研究的历史和现状表明，言外之意的研究是中国哲学的核心问题，代表了西方语言哲学和语言学的发展趋势。本论文研究的是言外之意的文学翻译，不仅在于言外之意蕴含了语言交流的目的、体现作者的意图，还在于它是文学创作的自觉追求和审美的标准，更重要的是在于译界少有人涉猎和研究。

本书以言外之意的文学翻译作为研究对象，突出言外之意翻译的生成和表达问题，确立含蓄式、寄寓式两种意向型言外之意和意象式、意境式两种审美型言外之意的研究核心，目的在于探讨文学作品中言外之意的翻译问题，重点在于理解和表达文学作品中言外之意理论体系的建构及其实际解释力。言外之意，顾名思义，是语言的超载意义，是语言使用过程中暗示的意向意义和文学作品中的审美表达。笔者在钱锺书关于言外之意的分析基础上，进一步将其划分为含蓄式、寄寓式、意象式、意境式，并根据各自特点归纳为意向型和审美型两种类型以涵盖文学作品中所有言外之意。意向型和审美型两种类型分别位于语言学和文学的两大研究阵营，他们各自所包括的两种形式既有区别又有联系：含蓄式又称修辞式是话中话，寄寓式又称情景式是话外话，二者的区别还在于对语境依赖度的不同；意象式又称象征式，多个意

象式言外之意的联结便形成意境式言外之意。两种类型言外之意在文学作品中的会合，不是人为分析的作用，而是语言文学本身的特质使然。这一描述性分析是在前人唯科学、唯艺术的基础上的超越和发展。

本书首先对翻译理论的意义观进行了历时的挖掘。研究结果发现，中外译论都经历了意义翻译研究的从无到有，从萌芽到成长，从雏形到发展。而言外之意的翻译研究也或隐或现地出现在译论中，近些年有萌芽的趋势。因此，言外之意的文学翻译研究便成了一种历史的召唤。另外，语用学、认知心理学的发展为语言的超载信息——言外之意的研究提供了可能性和理论保障；而美学心理学又对文学的审美特性提供心理分析模式。具体说来，语用学含意理论、关联理论、语用推理对意向型言外之意的生成与翻译提供了理论基础；审美型言外之意的生成与翻译建立在美学心理学、认知心理学图式理论基础之上；语用预设理论、认知心理学图式理论的研究与发展阐释了认知语境的建构与重构。

然后，本书探讨了言外之意的生成机制。针对众多的语用推理模式，本书将其进行整合，提出了意向型言外之意的推理模式，这是意向言外之意的生成机制；在推理过程中含蓄式言外之意和寄托式言外之意体现的仅是所需语境量的不同。同时，本书根据认知心理学的图式理论以及美学心理学原理提出了审美意象图式机制，这个图式机制既是翻译过程中生成审美言外之意的机制，又是译文中再造审美意义的依据和原型，原文和译文是这个审美意象图式的不同语言表现。

鉴于言外之意对语境的依存关系，尤其翻译过程中意向型言外之意的推理对认知语境的需求，认知语境的构建和重构对言外之意的生成和翻译具有特别的重要意义，本书花了很大篇幅对其建构和重构进行了研究。根据认知心理学中理解过程的理论，提出了以抽象语句、认知图式、认知能力和目的构成的言外之意的

认知语境，以及包括语句刺激——图示激活——知识选择——假设形成的认知语境建构模式。对于语境的重构，笔者根据语用预设的实质，提出翻译中的语境重构主要是翻译语用预设，根据言外之意所需将语用预设可以分为语言预设、功能预设和文化预设，其中对言外之意影响最大也是最重要的语用预设是文化预设，论文对文化预设的翻译作出了重点研究，归纳了五种翻译文化预设的方法，并考察了文化预设对文学翻译的影响和作用。

在言外之意的文学翻译表达层面，也是言外之意翻译的实践层面，本论文根据认知语境——推理机制和审美意象图式机制，借助赵彦春的一价译元推理翻译模式和二价译元推理翻译模式，提出了翻译意向型言外之意的语义、语义—语用、语用三个层面，以及受制于语境关联、基于三个层面的意向型言外之意的上下推移翻译原则，为直译、意译提供了依据。对于审美型言外之意的翻译，笔者在霍姆斯双图式翻译模式和姜秋霞的格式塔意象再造审美翻译模式的基础上，提出了审美言外之意的审美意象图式翻译模式，从意义翻译的实际出发，确定翻译转换的中介是审美意象图式，原文和译文是这个图式的不同语言表述。审美意象图式翻译模式弥补了姜秋霞关于文本整体审美意象模式过于宏观和概括的不足，对翻译实践具有更强的指导力。以上两类言外之意的翻译原则和模式均佐以例证，在翻译实践中检验其解释力。

总之，本研究体现了一种跨学科理论的解释力，证明了翻译学是一门跨学科的学科，同时还证明了文学翻译是科学翻译和艺术翻译的契合。

目 录

第一章 绪论	1
1.1 翻译研究的意义观	4
1.1.1 语文学范式翻译研究时期的意义翻译	5
1.1.2 语言学范式翻译研究的意义观	16
1.2 言外之意翻译研究的匮乏和不足	28
1.2.1 直觉感悟性	30
1.2.2 语用片面性	31
1.3 本研究的目的是与方向	32
1.4 本书研究方法和创新点	35
1.4.1 本书研究方法	35
1.4.2 创新点	37
1.5 本研究的基本框架	38
第二章 言外之意界说	42
2.1 言外之意的哲学探索	43
2.1.1 从言意之辩到言外之意	44
2.1.2 从哲学的符号学到语言学的语用学	50
2.2 言外之意的概念	55
2.2.1 意义、言内之意和言外之意	59
2.2.2 言内之意和字面意义	63
2.2.3 言外之意和含意	68
2.2.4 言内之意和言外之意的关系	73
2.3 言外之意的主要类型及其本质特征	76
2.3.1 意境式	78

2.3.2 象征式（意象式）	83
2.3.3 含蓄式（修辞式）	85
2.3.4 寄托式（情景式）	87
2.4 结语	89
第三章 推理机制在言外之意文学翻译中的运作过程	90
3.1 推理机制运作过程中翻译的本质	91
3.1.1 翻译是以译者和译文读者作为主体的语言符号 行为	91
3.1.2 翻译是译者或读者主体和客体相互作用的过程	92
3.1.3 翻译作为认知过程是译者一种综合能力的体现	94
3.2 推理机制的运行模式	94
3.2.1 文献回顾	95
3.2.2 言外之意翻译推理模式的提出	101
3.2.3 推理模式的诠释和刻画	101
3.3 结语	106
第四章 言外之意文学翻译过程中的审美意象图式机制	108
4.1 图式	108
4.1.1 图式理论	109
4.1.2 图式的特征	112
4.1.3 图式的分类	113
4.2 认知图式——认知语境的表征方式	114
4.2.1 认知图式	114
4.2.2 认知图式的概念	114
4.2.3 认知图式的运行方式	114
4.3 审美意象图式——象征式言外之意的表征	115
4.3.1 审美意象图式的概念	116
4.3.2 审美意象图式的形成	118
4.3.3 审美意象图式的结构	120

4.4	审美意象图式的联结——意境式言外之意的体现	121
4.5	审美意象图式是生成审美意义的唯一途径	123
4.6	结语	126
第五章	意向型言外之意推理中认知语境的建构和重构	128
5.1	言外之意翻译过程中语境的建构	128
5.1.1	语境的语言学研究和翻译研究	129
5.1.2	言外之意翻译中认知语境的概念	137
5.1.3	翻译中认知语境的特征	139
5.1.4	言外之意翻译中认知语境的建构基础	143
5.1.5	认知语境的建构过程	146
5.2	认知语境的重构	152
5.2.1	认知语境与语用预设	152
5.2.2	语用预设的概念	153
5.2.3	语用预设的特征	155
5.2.4	语用预设的翻译	156
5.3	结语	163
第六章	文学作品中言外之意的翻译	165
6.1	意向型言外之意的翻译层面和翻译原则	166
6.1.1	翻译语义层面	168
6.1.2	翻译语义—语用层面	171
6.1.3	翻译语用层面	175
6.1.4	意向型言外之意翻译的总体原则	176
6.2	审美型言外之意的翻译	176
6.2.1	审美意义的翻译模式	176
6.2.2	审美型言外之意的翻译实例	181
6.3	结语	185
第七章	结论	187
7.1	言外之意的现代语言学概念和翻译视角分类	188

7.2 两个机制、一个翻译原则和一个图式翻译模式	188
7.3 认知语境的建构模式和重构方法	189
7.4 文学翻译是科学翻译和艺术翻译的契合	190
7.5 需要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190
参考文献	193
后记	211

第一章

绪 论

系统的翻译本体研究是翻译理论自身发展规律的必然，是翻译研究发展史的强烈呼吁。两千年来的翻译研究，始于以译者个人翻译实践为基础的语文学范式研究，虽然闪烁着智慧的光芒，但所形成的各种思想观点一方面是对翻译实践的技巧性总结，局限于感性的经验层面，缺乏理论性、科学性；另一方面是以零散论点的形式出现，缺乏理论的系统性。语言学理论流派的出现，深入人心，可谓众望所归。奈达的等效翻译理论起初受到中国译界的全盘肯定（张南峰 2004：33）可以证明这一点。它对翻译研究进行了一次理论提升，使古老的翻译研究有史以来第一次有了属于自己的专门的理论术语，具有了理论的性质。然而，语言学派只停留在文本以内的研究，忽视了文本以外影响翻译的各种因素，使它的研究受到一定的局限。于是，翻译研究出现了文化转向。翻译研究的这一发展史告诉我们，翻译理论不论哪种范式只要走向极端，就是走向了死胡同，于是翻译研究就会出现转向。

文化学派应运而生之后，它把研究者的事业拓展到了文本以外，开拓了人们的视野，丰富了翻译研究的内容。但是，在另一方面，文化学派使翻译研究走向脱离文本、只谈文化的另一极端。道格拉斯·鲁宾逊（2006）把文化学派称为“离心式理论”（centrifugal theory），认为该理论具有非传统性、非经典性，与“向心式”（centripetal）理论/概念相对，主要展现解构、非中心、颠

覆式的研究企图和效果。(毛思惠 2007: iii) 吕俊、侯向群强调“应警惕用文化研究取代语言研究,即文化研究对翻译本体研究的剥夺,把翻译本体研究消解在文化研究中”(吕俊,侯向群 2006: 107)。他们指出,“目前的文化研究与翻译研究的结合还有很多内容未被涉及,深度也有待加强。但无论如何这种研究也只是整体翻译研究中的一个向度,而绝非全部。更不可以算作本体研究,它仍是一种离心式的外在性研究,而翻译学的继续发展仍主要依赖其内在性研究、基本体研究。”(同上: 113)同时,他们提出一种“建构主义翻译学”,指出“建构主义翻译学就是要返回翻译本体,重建这一知识体系”。(同上: 4)赵彦春因此而著《翻译学归结论》,强烈呼吁翻译本体论的回归:

“文化派从大处着眼,‘毅然决然地与文本内讨论相决裂’,这正好说明他们所研究的是翻译学的边缘性问题,因为翻译的基本规律——翻译之所以成为翻译的规律、翻译的制约因素——决定译与非译的因素,只能到翻译本身即文本(text)和成就文本的过程中去寻找。文化派从历史、政治、文学的角度切入,‘找到’了翻译的制约因素,但这是决定‘译蜕变为非译’(从改写到操纵乃至伪译)的因素,而不是决定‘译之所以为译’的因素。质而言之,这与翻译的本体研究恰是南辕北辙的。不错,从文本到文本的单一模式是不充分的,但翻译的根本问题毕竟离不开文本,因为文本(源语文本和译语文本)承载着语言和语言的转换,而语言又蕴含着文化因素。简言之,没有文本,翻译便不存在。语言的转换规律涉及翻译学最核心的问题,即(1)本体论问题:翻译是什么(Translation as it is);(2)认识论问题:翻译是如何运作的。翻译学要成为真正的‘学’就必须首先回答这两个问题。”(赵彦春 2005: 2-3)

相比之下,谢天振的语言较为温和,他指出不论是语文学派、

语言学流派还是文化派，“这些理论流派之间的关系并不是后者颠覆前者的关系，而是一种相互补充，同济共生，不断丰富、不断发展的关系”。（谢天振 2008：10）但是，他还是区分了翻译本体和翻译研究的本体两个概念，把翻译本体指向翻译过程中两种语言文字的转换过程本身；而翻译研究本体不仅仅局限于语言文字转换过程的本身，还包括译者、接受者等翻译主体和翻译受体所处的历史、社会和文化语境，并且还要包括对两种语言文字转换产生影响和制约作用的各种文本以外的诸多因素。由此，他把文化派划归翻译本体研究范畴之外。

由此可以看出，翻译本体的研究是翻译理论发展的必然结果，是历史的呼吁、是时代的诉求。

“本体是本来恒常的状况”，（张岱年 1987：66-69）那么，什么是翻译本体呢？前面提到谢天振认为翻译本体就是翻译过程中两种语言文字的转换过程本身；蔡新乐认为，翻译的本体就是指向与意义。（蔡新乐 2005：59）我们可以进行一下综合：翻译本体就是对原文意义的理解和再现的翻译过程，原文的意义是言内之意和言外之意的综合。

对于意义的翻译研究一直存在（这一点将在下一节进行详细阐述），但是由于相关学科的不发达，以及人们认识上的偏差，这方面的研究一直处于片面的、不完善的状态。比如，翻译语言学派对语义的探讨，语用学对语用意义的研究。尤其是言外之意的翻译研究，人们只对其中的语用意义，进行了笼统的研究。特别是文学作品中言外之意的研究，几乎还处在空白阶段。为此，本论文将对言外之意的文学翻译做一详细探讨。

在翻译研究以其自身发展规律使翻译本体研究成为译学研究之诉求的同时，语言学的发展使得这种诉求的实现成为可能。翻译学无论如何也是语言的具体使用，而关于语言使用的学科——语用学，其发展无疑会促进翻译学的进步。因此，林克难早在 1996

年就指出“语用——翻译理论下一个研究重点”。(林克难 1996: 46-49)吕俊也曾建议建构翻译学的语言学基础,认为语用学的“言语行为理论作为它的语言学基础才能更好地反映翻译的本质,也更能体现翻译活动的特点”。(吕俊 2004: 96)语用学的认识论和方法论,特别是“语用转向”以来形成的语用思维,成为了翻译学的新的出发点和成长点,它总结了“语言学转向”的合理成分和经验教训。同时,根植于语用学,关注讲话者意向、心理等,解决认知问题的认知语言学的诞生和发展,尤其,认知语用学的出现,为语用学更好、更全面地解决翻译过程中心理、思维方面的问题也提供了理论支持。另外,美学心理学、心理学的理论为言外之意的审美问题提供了解释力。因此,本论文拟以语用学、认知语言学、美学心理学、心理学为理论基础研究言外之意的文学翻译。为此,本文先回顾翻译理论中对翻译本体——意义的翻译研究,然后再回顾言外之意的翻译研究。

1.1 翻译研究的意义观^[1]

中外翻译学的意义观基本上都经历了语文学范式和语言学流派两个发展时期,前者是意义翻译的模糊的雏形阶段,后者是意义翻译的形成阶段。

语言的意义处在人类研究的焦点上,是各种思潮和各类学科研究的汇合处。哲学、心理学、逻辑学、语言学以及翻译学等学科对意义的研究都有着浓厚的兴趣。哲学的语言意义观是指语言与它所反映的客观实际的关系,是指概念或指称意义。心理学的意义观主要是指语言的主观方面,指人类对言语所反映的客观事物的不同直观感受,是内涵意义所表达的范畴。逻辑学的意义观

[1] 本部分已经发表论文两篇:语文学范式翻译研究的意义观[J]. 外语与外语教学, 2009(3). 语言学派翻译研究的意义观[J]. 外语教学, 2009(1).